

说事

被滥用的是心脏支架 更是行医权

内蒙古赤峰市患者黄金海,因冠心病体内被一次性植入9个心脏支架,总额15万元手术费清单中,心脏支架超过了10万元。术后症状非但没有减轻,反而日趋严重。9个心脏支架,是病情需要,还是过度医疗?记者调查发现,直径只有2到4毫米,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的心脏支架,价格不菲却被严重滥用。而对于心脏支架的使用,国内也无强制性法规和监管措施(《新京报》)。说白了,心脏支架被滥用,源于这种医疗设备可以赚钱的原因,如果也实行零差价销售,我想就会好不少的。根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统计,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,到2011年达到了40.8万例,增长近20倍,并以每年约30%的速度增长。这种快速增长里,究竟是人们的心脏问题多了,还是医院的问题多了呢?心脏支架被滥用的背后,实际上是行医权少了法律支架的原因,这滥用的是行医权。(雅然)

长得瘦就吸毒, 什么混账理由?

日前,三亚市民林先生向记者反映,其小舅子黄奕忠在经过三月月川村新市场时,因被怀疑为吸毒人员,遭月川派出所数名警务人员殴打。随后,黄奕忠被带到派出所验尿,尿检结果显示“未吸毒”。警方怀疑黄奕忠的理由竟然是:“你这么瘦,不吸毒,你骗谁?”(《海南特区报》)我最近本来是要减肥的,现在不敢去了。为什么呢?你懂的,怕瘦了以后被警方怀疑为吸毒人员。我真是搞不懂,吸毒的人会变瘦,然而,瘦人却不一定就是吸毒分子,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,警方怎么会不明白呢?因为人家长得瘦就怀疑人家吸毒,这是什么混账理由呢?警方这种歪理那说根本就是刀尖上打拳——站不住脚,要是这种论调都能成立的话,那单身女人不是卖淫就是小三,那单身男人不是嫖客就是强奸犯,不然他们如何满足生理需要呢?推理可证,警方的行为真是让人笑掉大牙,真是让人齿冷三天。(毕文章)

打破“铁饭碗”,切勿标签化点赞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“铁饭碗”即将全面打破。我国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条例)已实施。广东省人社厅发布了关于条例的解读,指出条例实施后最大的转变是将事业单位与职工确定为“合同关系”,下狠招打破终身制,实现人员能进能出(《广州日报》)。

《条例》还没有正式发威,就被贴上了打破终身制,破除“铁饭碗”的标签。应该说,被点这么多赞,体现出了公众对事业单位人事改革的期待。然而,我们犹记得,当初聘任制公务员启航之际,也曾赞誉一片,

可到头来,聘任制公务员不仅没扮演好鲶鱼角色,反而,增加了变向的铁饭碗。因此,对《条例》的实施,先别忙着点赞。

其实,事业单位作为法人,与工作人员通过签订聘用合同,建立“合同关系”,在2002年已经开始推行,如今基本上已经在事业单位全覆盖。而除涉密岗位,全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,也已经制度化、公开化、常态化。此次,《条例》的实施,与其说是人事管理上的创新,不如说是一次对以前制度的提炼、总结。对《条例》期望过高,最后很可能失望越大。

想想看,实现事业单位人员能进能出、岗位能上能下、待遇能高能低,不是我们以前大会小会一直提倡的么?如今,效果几何?聘任制实行已超过10年,真正解聘的又有几个呢?因此,只是把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,确定为“合同关系”,就希望解决人浮于事,多少有点一厢情愿。

事实上,无论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,还是公务员聘任制试点,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,都是好的,在制度设计上,也保持足够的前瞻性。但是,由于人事制度改

革,是改革的深水区、攻坚期,属于动奶酪的改革,因此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也最大,往往在最后举步维艰。其实,2008年在山西、上海等五省市启动的,事业单位改革试点,就是前车之鉴。

因此,我们不能觉得有制度就万事大吉。完成制度建设,其实只是迈出了改革的一小步,以后的路不仅遥远,而且漫长、艰难。故而,舆论先别急着点赞,把精力与时间,放在执行中的死角、盲点的监督上,要比点赞实用的多。

(薛家明)

落马官员何时成为“笑料”

增加更多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人非圣贤,谁能没有一点阴差阳错甚至是糗事呢。某些落马官员之所以会成为“笑料”,当然跟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关系,毕竟是领导,出镜率高,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但同时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们犯的错误太低级,有的有悖常识,有的脱离实际,有的则明显是作秀甚至是忽悠。600元租豪宅,这话普通老百姓肯定说不出来,这待遇普通老百姓更是享受不到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老百姓虽然是把“万600”当笑话说的,其实笑中有泪。由此折射出的民生维艰等问题触目惊心。

落马官员“笑料”多,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而一些“笑料”的曝光方式和路径,也颇多耐人寻味之处。一般情况下,只要官员还在台上,其“笑料”就只能在坊间悄然流传,很少有正规媒体敢于介入,更别提正面提出批评了。顶多被“好事者”发到网上,或许还可能面临被删帖乃至被“跨省追捕”的风险。而一旦官员落马,一些媒体便蜂拥而上,争着挖猛料、比着进行批评,成为“打落水狗”的主力军。这时候,官员的负面信息便会迎来一个“井喷”。

不少落马官员其实在落马之前就已成

为“笑料”,有的甚至N年前其“先进事迹”便已被坊间编成了搞笑段子。媒体介入为何常常滞后,恐怕还是由当前的媒体生态决定的——本地的不敢监督,异地的无法监督。于是造成一种奇观:当着某些官员的面,到处都是灿烂的笑脸和雷鸣般的掌声;可背后,却有无数人都在指指戳戳,将其当成笑话来说。

如果当某些官员刚刚闹出笑话,就有媒体站出来提出严厉批评,官员是不是就会怦然而惊,检点自己的言行,改变自己的作风,工作上更务实、生活上更慎独?果如是,则虽然官员当时很丢脸、面子上挂不住,却可能避免今后成为更大的“笑料”,有的说不定还能避免落马的悲催结局。媒体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正体现于此。

(乔志峰)

南京文心院是谁的“私人订制”

个人最低消费500元,想吃什么都有,鲍鱼海参等更是不在话下,没有提前预定和内部人员介绍,即使有钱,一般普通市民也很难进去消费。今年南京市江宁区城管局曾出过“关于配合做好‘会所歪风’专项整治有关工作的通知”一文,要求公园风景区,历史建筑内的餐饮企业不得设立围墙,围挡或牌示,禁止游人和市民入内。城管局当时检查发现过这处建筑,但对方声称只是普通餐饮企业。

常言说,有需求必有市场,躲在公园里这家私人会所,在全国上下贯彻中央八项规定,反四风,以及包括南京市在内几乎所

有城市都在大力整治会所歪风的“风声鹤唳”中,能够“躲过”这场风暴,并且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存在下来,必然有它的存在的“市场价值”。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,我们社会的确有不断追求高消费的富贵一族,热衷到这种隐秘场所消费以体现自身的与众不同,但仅从市场和商业角度来看,正常的餐饮场所无论怎样隐秘都无需这么戒备森严,更不用说四周拉铁丝网,进门要过三道岗。这样不仅让大多数消费者反感,也有悖商业规则。再说,也根本不需要只在晚上或夜间营业。

尽管媒体记者没有现场发现有开着公

车前来消费,人们更相信在眼下风声正紧的时候,没有哪位官员敢光明正大的跑到这来吃喝,但是,“有富豪的地方必不可少官”,这几乎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“潜规则”,尽管不少富豪热衷高消费,但这种高消费中却隐藏着更多的“无利不起早”,商业富豪尽管很有钱,但很少有人“无厘头”去糟蹋自己的辛苦收入,专程“闯关”到这种隐秘场所消费,往往都存在着明确的消费目的,那就是“傍权”,也因为需要“傍权”,为将官员出入会所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,也让他们之间的某种交易更具有“安全感”,会所才会按照“消费者”的要求,尽可能低调和封闭自己,实际上这正是“会所歪风”的共同特征以及需要大力整治的关键所在。

(朱永华)

不得使用蜡烛:看似霸道实则柔情

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大火为大理古城敲响了警钟,为了确保古城不出问题,大理市出台规定,要求经营户不得使用蜂窝煤,必须在房屋屋顶安装避雷针,不得使用液体酒精、木炭等作为火锅、干锅加热材料,停电时不得使用蜡烛。当地官方回应说这不是硬性标准(《京华时报》)。

不得使用蜡烛,如果把把这个规定放在市民身上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但是,看问题,要结合环境来看。在一个以木质建筑为主的古城,这样的规定看似霸王实则柔情。有人认为,政府防火也不能影响商户利益。政府如果能从改善火灾隐患的角度,对这里的景点和建筑进行改造,达到防火标准不是更好吗?这固然是一个办法,但是我们也要从实际出发,正确看待改造的困难。

在大理,很多旅游景点,很多建筑,都是古代形成的,很多都是易燃的木质结构。如果进行现代化的改造,无疑会破坏这些文化遗存的原貌。丢失了传统的厚重,丢失了历史的沧桑,古城的韵味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如果把木结构换成了钢结构,把竹板房换成了水泥房,安全倒是安全了,可是景点的特色也就消失殆尽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保护古城的完整性,改造,尤其是大动静的改造,或许就会成为千古罪人。

当地从防火的角度,设定了几个规矩,让商户来遵守。可以说这些规矩并不完全是因为政府的懒政,也是从现实需要角度考虑的。虽然,这会给商户带来一定不便,这种不便并不是不能克服的。笔者注意到,尤其是对停电的时候不准使用蜡烛的规定,网友和商户反对最为强烈。这已经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了,蜡烛不是照明的必需品。完全有可以替代的产品,而且这些东西的价格总体不会比蜡烛贵,也不会比蜡烛不方便。

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凡是看到政府的文件里出现“不得”、“不准”、“不许”这样的字眼就要谩骂,就要反对。的确,有的时候政府文件中的这些字眼是伤害了公众利益,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,有的“不得”、“不准”、“不许”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。正如这个停电不得用蜡烛的规定一样,谁能说受益最大的不是商户自己?

政府的规定是善意的,但是也不能有了规定,就高枕无忧。如多少停电,甚至是不停电,如何在停电的时候为商户搞好服务,比如启动自备发电设备也是应该考虑的,毕竟这是一个景区,我们还要考虑游客的感受。(郭元鹏)

“2.4分钟看1个病人”问题不全在医生

日前,为期两天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——2014年第一届广东医患沟通技能与医生自我成长培训在穗完成。各大医院医生平均2.4分钟看一名病人,被集体“控诉”太匆忙,医患沟通不良,被证实是导致医疗纠纷首要原因,限号看病于是被寄望能解决这一大问题(《广州日报》)。

虽然说问诊时间的长短不是衡量诊疗好坏的主要标准,毕竟每个疾病情况都不一样,有的疾病一眼就能看出来,有的疑难杂症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诊断出来。但平均下来,2.4分钟看1个病人,不管诊疗效果如何,显然都难以让患者及其家属放心、安心。

医生给病人看病时间过短,平均2.4分钟看1名病人,导致医患之间沟通不够,饱受患者诟病,无疑是造成医患关系得不到改善,加剧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尤其是挂号排队等候时间超过2小时,更突显了2.4分钟看病时间的短暂。

平均2.4分钟看1名病人,公众并不能全怪医生,不是医生责任心不够造成看病时间短。从医生角度说,绝大多数医生其实很希望耐着性子慢慢给病人问诊,

既提高诊疗效果,又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的交流,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,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,也让医生自己不必太劳累、太辛苦。

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,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医院,导致大医院、专家门诊成为公众心中最值得信任的医院和医生。不管是大病、小病,还是普通疾病、疑难杂症,广大患者及其家属更愿意前去大医院诊疗和医治,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。面对每天人满为患的现状,要让大多数病人能够及时得到诊治,缓解“看病难”,医生只得压缩给单个病人的看病时间。相反,在硬件设施较为薄弱的基层医院、社区医院,患者由于对他们不信任,不愿意去基层医院、社区医院看病,出现无人问津局面。

可见,要改善医患关系,缓和医患矛盾,必须破解“平均2.4分钟看1个病人”的现象。从治标之策角度说,实行看病限号制度,给医生看病人数规定上限,保障每名患者的问诊时间,但可能加剧“看病难”问题。从治本之策角度说,一方面,优化医疗资源分配,另一方面,推动医生自由执业改革,加强民营医院建设,扩充医疗资源大盘子。(张立美)

Advertisement for 'He + She' magazine. Includes text: '新晨报·周末版', '他+她 周刊', 'GENTLEMEN & LADIES', '2014年6月28日 星期六 第1009期', '零售:山东1元,省外2元'. Features a large photo of a woman in a yellow top and white skirt. Text on the right: '李冰冰性感爆棚《第4》首映礼', '苏荣落马牵出其夫人:“于姐”本事究竟多大', '中国舰队严防日越陆基导弹', '建初期苏联专家在华享高薪', '中国急建南海岛礁阵地藏玄机', '宣布要结婚,新歌却想追回前女友周董,你是闹哪样?', '民进党再提冻结“台独”议案', '中华医学会8.2亿赞助费哪里来', '李力群在丈夫高岗自杀以后'.

中国谍海战线上的第一外援

>>14版·史海钩沉